

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

10

社 会 调 查
自 白

费孝通 著

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

10

社会调查自白

费孝通 著

知识出版社

1985·8·上海

责任编辑：陈荣乐

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

10

社会调查自白

费孝通 著

知识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古北路650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梅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56毫米 1/32 印张2.625 插页4 字数65,000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

书号：17214·1035 定价：0.68元

序 言

(第二辑)

中国民主同盟中央,在1983年暑期所举办的第一期“多学科学学术讲座”的基础上,于1984年又举办了第二期“多学科学学术讲座”。

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1984年分两个阶段举办了“多学科学学术讲座”。第一阶段在暑假中假北京师范大学校址举行,共有:费孝通的《社会调查自白》、陶大镛的《世界经济和当代经济思潮》、邓广铭的《宋史研究、宋代经济发展史》、唐敖庆的《应用量子化学》、林传鼎的《智力开发的心理学问题》、冯之浚的《现代化与科学学》、张远谋的《工业结晶》、管锦康的《审计学》、谈家桢等的《生物工程》,以及韩伯林的《世界桥梁史》。第二阶段将在1984年年底举行,主讲人有:常迥的《信息科学》、张文佑的《地质学》*、张胜琨的《汽车排气的污染及其控制》等三讲。

1984年的各讲稿,其中除《地质学》和《工业结晶》业已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外,其余十讲稿将编入“多学科学学术讲座丛书”第二辑,它和第一辑一样,仍由知识出版社(沪)陆续出版。

*由张文佑教授主讲的《地质学》,原定1984年年底举行,但张文佑教授于1985年2月11日逝世,我们不胜哀悼,并停止《地质学》的讲座——钱伟长于1985年3月15日。

这次讲座的主讲教授都是民盟盟员，像费孝通、陶大镛教授又都是民盟中央副主席。他们都是我国知名学者，他们毕生从事某一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，他们在百忙中，不仅亲自上台讲授，并且写出了讲稿，提供广大读者参考学习之用。

1984年的讲座，除了继续为盟内和国内外知名学者提供讲台，讲授他们毕生从事的学术成就外，也结合我国四化建设，讲授了有关各种新技术、各种管理科学等内容，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。

民盟盟内有大量专家学者，为了更有效地动员起来，为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四化建设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，将在以后几年内继续举办“多学科学术讲座”，其讲稿也将陆续在“多学科学术讲座丛书”中发表。

钱伟长

1984年10月31日于北京

前 言

1984年7月23日到8月4日的两个星期里，我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的暑期“多学科学术讲座”里作了有关社会调查10讲。盟中央组织这个讲座的目的，是在贮存和扩散老一辈学者致力一生所得的一些知识，免得失传，有损国家的智力资源。我虽是这个讲座的倡议人之一，但是自问论资论学都够不上格，只是主持其事的钱伟长同志一意坚持要把我列入讲员之列，实在无法推托，勉为其难，滥竽充数，自觉惭愧。我所做到的只是在相当炎热的气温下，总算没有迟到，没有缺课。至于所讲的内容，只是些平时我常讲的有关本人从事社会调查的经过和体会的话。

我在课堂上讲话的习惯是事前大体上打一个腹稿，上场后即兴发挥，缺点是不拘章法，不求面面俱到，长处是不受框框限制，使一些听众受到言外的启迪，激发自动的思考。这10讲并非例外。我只把自己过去所做过的社会调查编排个次序，从民族、农村、家庭、小城镇到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，各讲1讲。讲我为什么想到做这些调查，怎样调查，又有什么体会。另有2讲是答复问题，共10讲。其中并没有多少技术性的指导，也说不上有什么高深的哲理，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自白罢了。

我讲话时录了音，讲完后请听我讲的上海大学李友梅同志，根据她听讲的笔记，参照录音，整理了一个稿子。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足足花了一个星期的紧张劳动，是很辛苦的。我在此表示我的感谢。稿子到了我手上，照例压积在我的书桌上，腾不出时间来校阅。入秋，上海大学沈关宝同志来北京，我就抓住他帮我把这份讲

稿看一遍。他觉得对具体的社会调查方法讲得太少，所以把第2讲重新编写一遍，补足了我这次讲话中的一些缺漏。同样要向他表示感谢。直到冬尽春至，跨了一个新年，我才挤出时间修改了一次。错失和疏忽的地方还是不少，只能请读者多多关照了。

费孝通

1985年1月28日于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费孝通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社会学家。此书的出版，是广大读者的迫切愿望。

本书是他从事社会调查科学工作的自白。他在本书里分别从民族调查、农村调查、家庭调查、小城镇调查及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等方面，进行了介绍和评述。字数不多但材料丰富，笔法生动引人，有说服力。对帮助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及如何进行社会调查等方面，均是一本较好的参考书。

作者职务

北京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研究所所长

中央民族学院教授

上海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兰州大学兼任教授

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荣誉院士

目 录

前言.....	1
一、引子.....	1
二、社会调查概述.....	7
三、民族调查.....	18
四、农村调查.....	27
五、家庭调查.....	39
六、小城镇调查.....	47
七、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.....	59
八、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.....	68

一、引 子

为了在中国智力总库里留下老一辈知识分子学术生涯所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，为了我们这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绵续长存的社会，民盟中央举办了这次“多学科学术讲座”。来这儿听讲的有全国各地的同志，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和讨论，我非常高兴，希望能得到好的收获。

我们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，正需加速智力开发以缩短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。因此，科学地培养人才，合理地使用人才，就成为我国在全球性挑战中能否取胜立足的关键，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一项任务。人才培养，智力开发，要靠我们已有的智力库。在我们现有的智力库里，七、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已经为数不多了，而且属于他们未来的时间也不多了，这是自然法则，不可抗拒。我在1980年时说过一句话：“大概我身边只有10块钱了，一年用一块钱也只能用到80岁，到那时就做不了什么事了，即使活着也顶不上大用，用起来或许还会害人。”这样说是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时间有一定的年限。这一点是年轻人感觉不到的，青年人往往把自己的生命与无限的时光等同起来，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，有时还会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。日本电视剧《血疑》用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：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的时候会怎么样？这里不但有自己怎么办的问題，也有别人怎么对待的问题。这部影片的主题给人以不少启发。

70至80岁的这辈老知识分子的时间虽不多了，然而他们在中国智力结构里有一个特殊的地位。他们受过严格的、有系统的教

育,大都学有专长,各有成就。他们毕生积累的做学问的经验,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财富。现在他们年事已高,来日不多,再不把宝贵的知识传给后人,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接班人的培养造成无法填补的损失。人死了,他的知识也随着去了,这是很可悲的。要知道,任何知识都不属于哪一个人私有的。它是全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,是共同智慧的结晶。个人从社会里得来的知识应当回到社会里去,这就要靠代代相传。后一代要在前一代人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更新发展。这是一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过程,而不是计算机或电脑所能替代得了的。因此在老一辈本身来讲,除了充分发挥余热,继续作出贡献外,还必须主动地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,使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得以延续和发展。

这部分老知识分子大多毕业于抗战之前的高等院校。那时有不少学校有浓厚的学术空气和良好的学习环境。他们在学校念书,也都有各自爱好的专业,大多能在博览各种书籍、广泛而又迅速地接触各门知识的基础上专门化。这种既有广度又有深度,两者相辅相成的知识传递方式,使学生一走出校门就能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。因此,尽管此后战乱不断,社会环境险恶,大部分人还是在科学领域作出了成就。可惜的是,全国解放后我们对科学文化学习、传授的规律性东西不予重视。相反,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作院系调整以后,理、工科分家,文、理科分家,搞专科分院制。学习各门专业的不强调普通数理化的基础,更谈不到文史的基本知识。攻读文科的不了解当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。进入了一个专科就不管其他科目了。学校的规章制度还限制了其他方面学习的机会和条件。过去清华、北大的课程就不象现在这样限得死死的,那时鼓励学生在学完必修课的基础上跨学科听课,窗台上都有人爬着听课。只要学校承认你是它的学生,听哪门课都可以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学术空气自然也就浓厚起来。大家碰头就能谈论交流,念人类学的遇上学语言学的马上就会说到一起去,和学生

物的也能讨论一番。

所谓学术，就是人对宇宙实体的认识反映，物质和精神世界本身混然一体，并没有分门别类。当然人在认识它的时候必须有分析，要有先后秩序；人们之间还要有分工，各有偏重，但人为分割的各部分之间是互相联系着的。假如我们把这种分割绝对化，单刀直入，只专一门，在某一个孤立点上做学问，那么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客观世界存在的奥秘，也就不可能有新的学术成就可言。比如学写文章应当学会写杂文。学术研究也应当搞点“杂文”。“杂”，就是多样化，多种学科的互相交流，互相渗透，融汇贯通，全面发展，这样才能有学习和研究的深度。

当年，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，十分重视基础知识。就我自己来说，我的底子就不是现在一般的底子。我学医预科是准备上医学院的。那时医学制度要求两年预科、五年专科。预科就是打底子，包括自然科学的底子，如物理、化学，主要是生物、心理。还学哲学、逻辑、外文、国文，国文里还有版本学。我是在这个基础上转入社会学的。社会学念了三年又转学人类学。

人类学是一门知识广阔的学科，从体质到语言、到文化、直到考古。文化、语言、体质都有历史的纵向区分（如猿人、智人与现代人等）和地域的横向区分（如亚、非、欧等洲）。我是在清华研究院学的人类学，我之所以能搞学体质人类学是与我两年医预科的基础分不开的。在清华补习了解剖学和动物学，由于研究需要还学了数学。

总之，应当是在广泛的学术基础上去搞专门学科的，有了一定的基础才能进入研究阶段。基础与专题研究尤如学与习的关系，基础强调“学”，研究重于“习”，学多了才能论及习。学习二字，学字当先。研究一门学问，一要讲基础，二要讲主观能动性。我在研究生期间，老师只给出题，出完了就让我自己去做，平时很少见面，老师只是在晚上散步时来我的研究室检查我的工作。我的资料都

摊在桌上，他看了看，没有问题就走了。有问题就给我留个条，上面写着“重做，错了”，也不说错在哪里。我得重新把一个星期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结果再做一次。为了找出错的原因，我开动脑筋。老师并没有给一套现成的公式。怎样答题，怎么改错，从来就是我自己的事。久而久之，我懂得了做学问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的道理。可以说迄今为止，我一生中所做的研究都离不开那时的基础。

客观地说，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比过去复杂得多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感到困难。因此，我们更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，看到我们现有的知识微不足道。可是，现在许多大专院校仍然是文、理分科，隔科如隔山。教学方法还是教师照本宣科，学生死记硬背，知识面越来越窄。近年来，我们是引进了不少先进设备，但先进的科学文化又引进了多少？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是过去从苏联搬来的，现在苏联改了，我们还是那一套。看来，我们并不了解别人，也不认识自己。

我们老一代向前看，看到的是下一代。下一代是国家的未来，我们有责任去引导他们，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。

我这一辈子做了不少事，应当把我的好经验、好传统传授给下一代，其中最主要的也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的就是认识中国社会，为中国社会尽一点力。然而，中国社会如此之大，又有悠久的历史，一个人的一生想要穷尽对她的认识显然做不到，可是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，首先就是认识中国社会，这是一个矛盾。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是脚踏实地做研究，一辈子不停顿，世代代不间断，积有限认识为无限认识。这就要求我们首先从现实出发，实事求是地探讨客观规律。科学之道在于实事求是，科学结论不能靠主观臆想。诚然，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不免会产生偏见，会或多或少地掺杂一些主观的东西。我们要正视这一点，正视它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去克服它。不断地克服主观偏见就意味着我们的认识在逐渐深化，使之更接近客观实际。

我想把我自己作为一个标本让你们解剖。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正好是50个年头，我写的《从事社会学五十年》可作为你们解剖用的材料之一。我的《学历自述》为大家提供了关于我的学历的梗概，可以说是一幅速写，你们不妨先看一遍，再来认识我这个人。社会学在停顿的30年间，受到了批判，我从批判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会解剖自己。今天我希望大家也来解剖我，当然今天的解剖不同于过去的“大批判”，而是科学地分析一个人的思想过程，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教训。有个美国人把我解剖了一下，写了一本传记，一位日本人看了后说：“他把你写成了一个西方化的学者，而你不是。”看来各人看法不同。我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？希望大家在读我的书的时候，看看我的思想有没有中国的特点，这些特点又是怎么表现出来的，以及找出我在书中所讲的根本东西是什么。有人认为我的书好看，其实那些最好看的地方正是功夫最不到家的地方，因为道理讲不清楚，就要耍花腔。花腔的确能吸引人，但那只是才华而不是学问。我的哥哥曾批评我：“才胜于学，华多于实。”说的就是功夫不到家。所以我希望青年人千万不要学我的笔法。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无穷变化的世界，学习容不得半点停顿。人们都知道百万年前“北京人”已经知道生火，可是至今还有人不会生炉子，所以，学习是无止境的，到老也学不完。当然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去搞科举，不要为升级或提职去大写文章，要从认识中国社会出发，多了解一些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。了解别人才能对自己有所认识。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《读书》杂志上，叫《我看人看我》。我说我喜欢看人看我，因为很多事，自己身在其中，模糊不明。这一点我想大家会有同感。学社会学的人不但要学会认识中国社会，同时也要学会认识自己。过去封建领主的信条是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而在当代社会，民必须有自知之明。人只有懂得自己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关于这个道理，我不想多花笔墨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。

既然请你们来解剖我，就得开一个书单。最近两年我的旧著已经重印的有《重访英伦》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），包括《初访美国》和《留英记》两篇在内，都是反映我早年在海外生活时的观感；《生育制度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）是我三十年代在大学讲课时写下的对家庭理论的探讨。正在印的《美国与美国人》（三联出版社出版），是我第一次访美后写的。已出版的《访美掠影》是我第二次到美国所看到的情况，由于时间不长，只呆了两个月，所以叫“掠影”。还将重印的是《乡土中国》，这是讲乡土性社会特点的书，是从具体调查中抽象出来的。关于社会学的文章加以汇集起来的小册子有《民族与社会》、《从事社会学五十年》、《社会学探索》等。第四本叫《论小城镇及其它》还在印刷中。我还喜欢写短篇杂文，已出版的有《杂写甲集》和《杂写乙集》，我还打算继续写短文，大约每年可以出一小册，丙集、丁集这样出下去，不知还能出几集。

开列书单无非是提供解剖工具，解剖手术还是要你们自己动手。这就是说不要企望能从我的这次讲课里得到一套现成的模式和答案。我们一起来作尝试，打破原先的框框，跳出过去习惯的那一套教学方法。因此，在这10讲里我不想从任何结论出发，不讲什么定义，只讲我的一生是怎样从事社会调查的，以及这些调查是怎样影响我的思想的，希望大家在其中找出解剖我的突破口，并有所收益。

二、社会调查概述

有些同志很想通过这次讲座得到关于社会调查的定义，还希望从这儿带走一套现成的社会调查方法，以便回去向领导汇报，并照此办理搞调查。我想提醒有这种想法的同志，那是不现实的。我不想从定义出发讨论问题，也不专门介绍各种具体的调查方法。我要讲的是社会学研究怎么入门，怎么调查，是我个人的体会，给你们作参考，起一个样本的作用。

给一个样本，或者即便是开出一套方法来，都不能把它作为教条去照搬，而只能是从中得到某些启示。要知道任何一种社会调查的经验和方法，都是别人从彼时彼地的具体的社会调查中获得，并加以总结提高的。而接触到的客观事物、现象都因人、因时、因地而异，各有其不同的内在联系，有着千变万化的发展过程，有不同的类型。所以，我们不能用某一个模式去硬套，也不能机械地搬用某种方法去分析具有不同特点的研究对象。

硬套和搬用本身，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理的。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，要根据我国的特点，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。我认为这也是社会调查的思想原则和根本出发点。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应当学习它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，而不是局限于某些具体的结论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要重视从过去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规律性的东西，用以指导今后的认识过程；与此同时，我们更应强调在事物的不断发展中总结新经验，研究新问题，得出新东西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想大家一定懂得很多，希望我们都能以此作为这次学习的指导思想。

下面就社会调查的过程，概要谈谈社会调查的一些方法问题以及我的认识和体会。

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，任何调查都必须经历一个既要符合客观事物、现象的发展路线，又要符合人们的认识路线的过程。现在一般把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，即定题、计划、实施和总结。这四个阶段一环紧扣一环，使我们对要认识的事物从无知到有知。但这一过程并不是单一性的，它是从整个人类认识史中抽取出来的小小的一步。事实上，这四个阶段总是在作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，后者步着前者的足迹继续走下去，人类的知识不断积累，认识逐渐深化。

我们知道，不管认识过程分为多少阶段，怎么符合事物发展的路线，调查者在各个阶段的实际行动与表现，却不是过程本身所能完全控制的。因此，社会调查能否取得成功，关键还在于研究者的调查态度。能不能实事求是，敢不敢坚持真理，能否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，都离不开有没有一个认真的态度。

这里特别需要指出，社会调查不同于物理、化学等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。自然科学工作者对他们研究对象的态度好坏，丝毫不影响对象的性质及其反映。可社会调查所面对的是与我们同样的活生生的人，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、一定社会集团的“社会人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研究者的立足点在哪里，态度是否诚恳，被调查者要先了解清楚了才能回答问题。这就是说我们要调查他，他先得“调查”你，然后再决定是否让你调查他。这个互相调查的过程很微妙，一旦被调查者发现你的调查态度不那么诚恳，或者你的调查会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损害，他们就不愿意接近你，不肯说出真心话。由此可见，社会调查不仅仅只是一项科学研究，还有群众工作的内容在内。

我常说起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开了几个座谈会，到会的也不过是几个人，他就能写出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》一文，解决了中国革